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2, No. 1, 2026, pp.29-38.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60104sccsr>



文化结构中的主体建构

——文化唯物主义视域下的《长日留痕》

郑丹彤（Zheng Dantong），王桃花（Wang Taohua）

摘要：石黑一雄的小说《长日留痕》以回忆与现实交织的叙事策略，将人物置于多元历史语境之中，揭示了文化结构制约性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复杂张力。立足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视角，对小说所建构的特定历史时期文化结构与人物主体展开剖析，可揭示出，人物主体在受制于整体社会意识形态规训的同时，又以多元实践姿态参与文化结构的重塑与变迁。将小说置于其生成的历史文化场域中考察，能够清晰呈现作家挣脱保守文化结构的规训、借文学创作对文化结构展开批判性反思的主体性表达。石黑一雄以“怀旧”为叙事表象，既对保守怀旧主义展开批判性反思，亦对当代政治文化语境中个体的发展困境予以深度关切，由此完成了对文化结构现实意涵的文学书写。

关键词：《长日留痕》；文化唯物主义；文化结构；主体建构

作者简介：郑丹彤，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国现当代文学。电邮：zhengdt5@mail2.sysu.edu.cn。王桃花（通讯作者），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国现当代文学、空间研究、城市文学研究。电邮：wangth3@mail.sysu.edu.cn。

Title: Subject Construction in Cultural Structure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Abstract: Kazuo Ishiguro's novel *The Remains of the Day* adopts a narrative strategy that interweaves memory and reality to situate its characters within a multifaceted historical context,

which reveals the intricate tension between the constraining forces of cultural structures and the agency of individuals. From the theoretical point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an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historical-period cultural structures and character subjects constructed in the novel reveals a nuanced dynamic. These character subjects, while subjected to the disciplinary power of the overarching social ideology, participate in the reshap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structures through diverse practical engagements. When analyzing the novel in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etting, the author's subjective intention to break away from the shackles of conservative cultural structures and conduct critical reflection via literary creation is clearly shown. With "nostalgia" as a narrative disguise, Ishiguro not only offers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conservative nostalgia but also expresses profound concern for the developmental dilemmas confronting individual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thereby achieving a literary depiction of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cultural structures.

Keyword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cultural materialism; cultural structure; subject construction

Author Biographies: **Zheng Dantong**,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zhengdt5@mail2.sysu.edu.cn. **Wang Taohua**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Spatial Studies, Urban Literature Studies. E-mail: wangth3@mail.sysu.edu.cn.

引言

石黑一雄 (Kazuo Ishiguro, 1954-) 是当代著名的日裔英国作家, 其创作以鲜明的“怀旧”叙事特质著称。在其代表作《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89) 中, 通过主人公史蒂文斯的回忆性叙事, 石黑一雄将小说人物的命运与英帝国时代的兴衰交织在一起, 从而剖析了“怀旧”主题下个体与文化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动态关系。史蒂文斯是一位服务多年的英国管家, 1956年, 他进行了一次为期六天的公路旅行, 在旅途中回顾了自己在二战前后于达林顿府工作及与人交往的经历。过往研究大多关注这一角色的管家身份引发的主体性丧失 (Gehlawat, 2013; 林萍, 2018; Terestchenko, 2007), 却忽视了文化结构的更深层影响, 未能揭示史蒂文斯及其他角色背后复杂的文化内涵, 以及个体与文化结构的互动关系。此外, Beedham (2010) 指出, 既有研究普遍关注《长日留痕》中的不可靠叙事, 小说所彰显的“怀旧”书写, 实则是主人公对记忆的重塑与再建构。邓颖玲 (2016) 指出, 通过展现主人公回忆的不可靠性, 石黑一雄揭示了人类如何主动“操纵”原始记忆, 以建立起一套自我保护机制。Colombino (2024) 认为, 小说中的“怀旧”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 个人叙事被认为掩盖了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但问题在于, 这种对“怀旧”负面效应的认知, 是否遮蔽了个体在应对历史文化变迁过程中对自身主体性的积极建构? 事实上, 在小说所营造的“怀旧”群体氛围中, 并非只有史蒂文斯,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甚至作家本人都在参与着文化结构的

变迁，且与文化结构产生双向互动。“怀旧”也并非仅仅是对过去的简单重复和沉溺，而成为个体反思过去、审视现在并重塑主体性的契机。

当聚焦于小说中“怀旧”与个体政治文化体验的交织时，文化唯物主义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文化唯物论界定为“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下探讨文化和文学之物质生产特殊性的理论”（Williams, 1997, p.5），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将经济结构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作为编织文化的引导绳”（Williams, 1959, p.287）。由此可见，文化唯物主义强调文化与物质生产的紧密联系，以及社会经济结构对文化形成的决定性影响。继承威廉斯的衣钵，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提出了唯物主义观下的主体性概念，指出“受矛盾的社会与意识形态进程影响，主体从来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也绝非一个自主自决的意识中心”（Dollimore, 2010, p.269）。从唯物主义主体性观念出发，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并非抽象人性的体现，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孕育的产物。同样地，文学批评也不能脱离现实而存在，而要着重关注作品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联，“对与文学和批评均紧密相连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现实展开积极且明确的探究”（Dollimore, 2010, p.249）。这就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石黑一雄对过往政治与历史语境的重构，以理解其在小说“怀旧”表象下对帝国文化、主体身份与历史整体之间关系的更深层思考。

在《长日留痕》中，昔日的帝国民众既受制于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又不得不对动态发展的历史作出回应，这种主体与文化结构双向建构的动态关系，正是文化唯物主义的核心议题。依托威廉斯提出的文化概念，可以更全面地审视小说内外的政治文化环境及其对人物个体的影响；借助多利莫尔的主体建构理论，能够洞察到个体在受到环境制约的同时，也对文化结构整体进行回应与反抗，展现出小说人物主体的能动性；通过探讨作家主体与文化结构之间的双向互动，能够进一步揭示作家主体的反思与建构。基于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视角，本文通过剖析与小说相关的英国不同时期文化结构，探究小说人物主体、作家主体与文化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进而揭示石黑一雄创作中潜藏的政治文化观念，重新评估小说文本的政治文化价值。

一、文化结构的意识形态规训：主体的服从与失语

在《长日留痕》中，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力量相互交织，形成了多元且动态的文化结构。在文化唯物主义视域下，文化不再被单纯视为上层建筑，而是“关系到更为广泛的现实领域”（Williams, 1997, p.111）。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对“霸权”（hegemony）概念进行了文化领域的延伸，将其界定为“代表某一历史集团利益的意识形态力量，为取得政治、知识和道德领域里的领导地位，不断与其他力量冲突、商讨、妥协以及接合的过程”（周兴杰, 2006, p.549）。威廉斯（Williams, 1985, p.145）指出，对“文化霸权”的运用，实现了“将政治主导地位的概念从国家间关系拓展至社会阶级关系”的转变。这意味着，统治的形式不仅体现在政治与经济制度层面，还蕴含于积极的社会经验与社会意识之中。借鉴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概念，威廉斯（1997, p.113）将政治文化这一动态系统阐释为“许多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文化力量组成的复杂关联体”，其中总是存在着“替代性的或直接对立的政治和文化形式”，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会与主导文化产生矛盾和冲突，促使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文化结构。

在小说中，史蒂文斯所处的现实时间是1956年，此时英国正逐步丧失其世界霸主地位，同年苏

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更是让其失去了在中东的重要势力支撑。这一现实与史蒂文斯回忆中大英帝国的辉煌形成了鲜明的文化落差。彼时，英国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过渡时期，社会正因政治变动而转型，首要表现即是从战时物资匮乏转向了战后经济复苏。为加速经济恢复，英国国内再次兴起加强与巩固帝国地位的呼声，这一主张得到了民众广泛支持。在文化唯物主义范式下，任何社会、任何特定阶段，均存在一个实践、意义与价值的核心系统，即威廉斯所谓的“组合系统”（a corporate system）（Williams, 1980, p.38），这一系统并非固定不变、抽象的，而是动态变化、基于物质基础的，它塑造了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形态（Durham & Meenakshi, 2006, p.135）。在小说中，二战前后英国的“核心系统”呈现为以贵族私宅为决策中心的帝国权利运行模式：“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轮子，以这些豪宅为中心旋转着”（石黑一雄, 2008, p.95）^①。昔日辉煌的达林顿府，是帝国鼎盛时期物质财富与政治领导力的象征，各国政治高层云集在此，商讨决定世界政治走向的大事。真正的权力源自贵族显赫门庭，而非政府议事厅，这一独特的文化结构无疑加剧了统治阶级对个体的意识形态规训。

这种以绅士文化为核心，融合贵族精神、等级制度与帝国意识的英国传统文化体系，既以当时英国丰足的物质基础为依托，又深深嵌入每一位英国公民的社会实践之中。正如威廉斯（Williams, 1959, p.300）所言：“我们要理解这些文化，就必须致力于探究那些显见的事物——即整体的生活方式”。文化唯物主义将文化纳入物质生产过程进行考察，揭示出人们的现实社会活动无不渗透着文化的意义表征。在精英主义意识形态的熏陶下，英国民众形成了对帝国统治高度服从的态度，以小说重点刻画的管家阶层表现最为明显。以老史蒂文斯为例，这位垂暮之年仍坚守岗位的老人，在达林顿府举办的高层会议临近之际，“仿佛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支配着他，使他一下子年轻了二十岁；往日的那种低沉神情在他脸上差不多已荡然无存，他干起活来是那么精力旺盛”（64）。即使因过度劳累倒下，他牵挂的仍是府邸内事务是否顺利。这种服务至上的管家性格，无疑是当时英国文化结构的典型产物。正如史蒂文斯所言：“如果你要想象杰出的男管家是什么样的人，几乎可以准确地这么说，他必定是位英国人”（36）。

作为父亲的接班人，史蒂文斯受帝国文化的影响更为明显，直接表现为他对那些“雇用我们为之服务的伟大绅士”的崇拜（200）。他将在达林顿府召开的会议称为“达林顿勋爵长期策划出的最佳之作”（58），反复强调这一会议的重要性并以此训诫下属，宣称“历史将会在这府邸里被创造出来”（64）。史蒂文斯对勋爵推崇备至，评价其是“完完全全的绅士，亦是我今天深感自豪曾将我服务的最佳年华为之奉献的人”（51）。他将服从勋爵的命令内化为职业尊严，并断言：“除非我已尽我所能去照料勋爵顺利完成他赋予自己的那些伟大使命，我的职业才会功德圆满”（141）。即使对勋爵的某些主张存有疑虑，他仍坚持履行命令，认为“男管家之职责便是提供良好的服务，而不是干预国家大事”（161）。然而，当史蒂文斯在旅途中被误认为名流乡绅时，他并未澄清身份。这表明，他真正引以为傲的并非卑微的管家职位，而是想象中参与政治秩序建构的主体身份——即便这种参与以牺牲个人独立思考为代价。在此意义上，史蒂文斯受制于当时的文化结构，丧失了个人应有的主体性。人是社会的产物，管家阶层的身份认同亦根植于当时优越的政治文化氛围之中，这一优越感则源自英国曾作为世界霸主的地位。当帝国昔日的荣光消逝，受文化结构意识形态规训的主体便会

^①文中所有该小说的引文均出自：石黑一雄（2008）：《长日留痕》，冒国安译。译林出版社。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陷入原有身份的困境，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价值。

在当时英国文化结构的影响下，女性主体被边缘化的现象同样显著。文化唯物主义主张女性主义实践应“将性别与父权制等不稳定结构追溯至其所在历史时刻的矛盾中”（Dollimore, 1994, p.11），这意味着需要结合具体历史语境，剖析性别、父权制与社会矛盾之间的关联，从而揭示女性边缘化的根本成因。以小说所依托的时代背景为例，一战的爆发和升级使大量英国男性投身战场，为填补劳动力缺口，许多女性从家庭走向职场。然而，随着一战结束、男性返乡，绝大多数女性被迫返回家庭，在政治文化领域中依旧缺失话语权。尽管实践已证明女性的工作能力不逊于男性，但在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与父权制家庭形态的双重桎梏下，战后英国女性的地位并未得到提升。在《长日留痕》中，女管家肯顿小姐热情活泼、聪明能干，但其鲜明独立的个性却难以在男性主导的文化结构中寻得立足之地。当达林顿勋爵无故解雇犹太女仆时，她勇敢地向史蒂文斯提出抗议，直言此举“犹如过去任何的罪孽那般可恶”（122），并表明自己不愿继续在这样的府邸工作。然而，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环境下，女性就业机会稀缺，为求生存，她最终并未选择辞职。她向史蒂文斯坦言：“我当时是多么认真地考虑过离开这府邸。所发生的一切对我的刺激是那么强烈。倘若我是那种无论如何都值得尊重的人，我现在敢说，很早以前我就已离开达林顿府了”（125）。在她看来，自己并非男性那种“值得尊重的人”，不可逆转的阶级观念与性别差异已植根于她的意识形态中，成为束缚其主体性的结构性因素。她虽试图为史蒂文斯的配膳室增添色彩，甚至向这位沉默的男管家表露心迹，却均遭其漠视，最终只能远嫁他乡。在英帝国主义的保守社会语境中，父权主义是“为适应社会秩序和稳定的需要而产生的”（向荣, 2001, p.98），这在当时已成为多数英国国民的政治文化态度。在父权主导的文化结构制约下，肯顿小姐无法摆脱自主意识被消解的命运，其追求自由和幸福的个人斗争注定失败。

文化结构是嵌于社会系统之中的深层力量，对个体身份认同的构建与行为模式的塑造具有深远影响。在《长日留痕》营造的叙事场域中，帝国权力中心所构建起的文化结构，展现出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规训能力。以史蒂文斯父子为代表的管家阶层，沉溺于这种文化结构划定的角色框架之中，沦为了权力规训下的顺从主体。以肯顿小姐为代表的女性角色，则因在既有文化结构中缺乏足够的权力资源与发展空间，逐渐被强势的父权文化遮蔽了主体性，进而陷入话语失权的困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达林顿勋爵作为帝国权力的象征符号与利益阶层的典型代表，似乎从当时的文化结构中获益更多。在此情境下，他是否实现了更具积极意义的主体建构？史蒂文斯后来踏上了乡村旅途，置身于截然不同的文化结构中，又是否会引发他的思想转变？要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剖析主体对文化结构的回应策略，以及在回应过程中主体呈现的能动性。

二、文化结构的时代转型：主体的固守与重构

尽管《长日留痕》以史蒂文斯的个人叙述为线索展开叙事，但透过其视角，仍能清晰洞察当时英国民众面对社会变革时的反应。如蒋怡（2013, p.124）所言，在史蒂文斯的旅行历程中，“战后的英国也在重新界定国民身份”。在文化唯物主义视角下，主体在受到现时文化结构制约的同时，亦以多元方式回应社会整体意识形态的变迁，进而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利莫尔提出的主体建构理论，正是在唯物主义框架下反思文化、社会与主体的关系，进而“在主体身份中描述社会进程”（Dollimore, 2010, p.19）。在《长日留痕》中，既有积极回应文化结构的人物，也不乏被历史浪

潮裹挟而作出被动回应的角色，体现了主体与文化结构之间复杂的动态关系。在权力关系构筑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既要正视“文化结构对主体的制约和限制”，也要认识到“主体在实践中的能动性”（胡庆龄、王丽，2009，p.22）。这意味着在关注个体受主导意识形态压制的同时，也需肯定个体作为他异因素参与文化结构和实现主体建构的存在价值。

在与文化结构互动的过程中，达林顿勋爵始终秉持积极姿态并付诸实践，然而这种积极参与并不等同于有效的主体建构。他声称要“维护这个世界的正义”（60），怀揣人道主义思想投身政治事业，最终却沦为法西斯政权的傀儡。勋爵的失败并非无迹可循。在修正《凡尔赛条约》的总结会上，史蒂文斯观察到，勋爵在致辞最后“开始缅怀起他已故的朋友卡尔—海因茨·布雷曼先生来。这就让人有点遗憾了。因为这个话题一直只是勋爵的心事，而他倾向于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表明”（81）。尽管勋爵宣称修正条约的原因在于“以那种方式对待战败的敌人太让我们丧失名誉了。这完全违背了这个国家的传统”（59），但其无意中流露的真实情感却表明，其改变英德关系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身绅士身份的考量。他需顾及与德国友人的交情，并寻求对友人自杀而产生的心理补偿。达林顿勋爵看似积极投身国际事务，实则仍受困于英国贵族阶层保守自私的文化结构，以至被美国大使刘易斯讥讽为“业余政治家”（84）。英法代表与美国大使之间的激烈交锋，影射了“贵族时代的绅士政治与民主时代的实用政治”的冲突（金万锋，2011，p.96），其结果在当下已见分晓。二战后，英国选举产生社会民主主义工党政府，中产阶级逐渐成为社会主体，绅士政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达林顿勋爵未能洞察社会结构的民主化趋势，固执地认为“民主是某种适合过去时代的东西”（169）。这种对历史发展的抵抗最终只能归于徒劳，达林顿勋爵为政治事业的奔波也成了“可悲的浪费”（163）。

相较于达林顿勋爵对文化结构的积极回应，史蒂文斯的态度显得消极许多。起初，面对新雇主法拉戴先生带有“美国性”的玩笑话，史蒂文斯显得无所适从，构思的回应也显得老套而滑稽。在叙述这段轶事时，史蒂文斯不断强调自己的英国身份和雇主的美国身份，将自身的窘迫处境归因于两国文化的不可调和：“他（法拉戴先生）毕竟是一位美国绅士，他的言谈举止和英国人往往是大相径庭的”（11）。二战后，随着反殖民运动的兴起，英国已不再是昔日强盛的殖民宗主国。殖民地居民向英国本土迁移，其他国家的国民也融入英国社会生活，推动英国逐步向多元文化国家转型。在旅行伊始，身为帝国遗民代表的史蒂文斯对新兴文化仍持排斥态度，仅将“提供有趣的逗弄”视作“良好职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12），并未真正接纳雇主打趣逗乐的方式。直到旅程接近尾声，他才认识到调侃打趣可以成为“人间温情存在之关键”（200）。在象征身份探寻的旅程中，这位原本保守克制的管家逐渐迎来了思想转变，标志着他对战后英国文化结构转型的逐步适应。

史蒂文斯的这一转变与他在旅途中的经历息息相关。在乡村旅行其间，史蒂文斯遭遇的是全然不同的文化体验。在文化唯物主义视角下，文化有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之分，不同的文化形式映射出不同的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与从属成分之间相互对抗又彼此交织，共同构建起一个动态的文化结构体系，而“乡村社会的理念也主要是残余性的，从某些限定的方面来讲，它同大城市的工业资本主义处于相互取代或彼此对立的关系中”（雷蒙·威廉斯，2008，p.131）。这种乡村残余文化具备发展为新兴文化的潜力，因此，史蒂文斯从代表权力中心的府邸走向象征民主的乡间，实际上是从旧的主导文化走向了潜在的新兴文化，从居于统治地位的帝国意识形态走向了居于从属地位的民主意识形态。

在旅途中，史蒂文斯结识了诸多有别于豪宅权贵的普通民众，收获了许多与深宅管家生活迥异的乡间见闻，感受到了人间温情。行车途中，他遭遇母鸡挡道，因未碾死母鸡而获得母鸡主人的感激。这一简单的善举让他罕见地敞开心扉：“我因单纯的善意而受到感激，也收到了单纯的善意作为回报，这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对未来几天里将面对的整个旅行计划感到特别振奋”（57）。其后，因汽车熄火，史蒂文斯被泰勒夫妇带回家里暂住。热情的村民纷纷前来探望，并与他就“尊严”的内涵展开辩论，乡村的民主观念开始与史蒂文斯根深蒂固的帝国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来自乡下的哈里·史密斯先生认为：“英格兰是个民主国家，居住在这村里的我们像那些奋斗以维护民主永存的人一样遭受过同等的磨难。现在我们责无旁贷地要行使我们的权利，这是每一个人的职责”（153）。尽管史蒂文斯认为史密斯先生“异想天开”，但这种新兴的民主观念已悄然渗入其意识形态，并与植根其中的帝国观念发生对抗。在小说结尾，史蒂文斯与一位同具管家背景的陌生人交谈后，最终意识到：“应该停止过多地回顾过去，应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而且应尽力充分利用我生命的日暮时分”（200）。他在旅途最后完成了对旧式帝国管家身份的解构，决意接纳新式文化，回去让新雇主“满意地大吃一惊”（200）。他已承认先前被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蒙蔽所犯的错误，并在对未来的思考中展现了对重建自身主体性的努力。

在主体与文化结构的互动中，主体既为整个文化结构所制约，又以自身的实践活动参与并形塑这一结构，进而可能对自身主体性进行颠覆与重构。在小说中，达林顿勋爵积极投身文化结构变革，却因受英国贵族阶层保守文化结构的束缚，未能洞察社会民主化趋势，最终在政治事业上徒劳无功，成为时代转型中主体固守旧有模式的典型。与之相反，史蒂文斯起初消极应对文化结构转型，但在经历乡村残余文化的洗礼之后，他最终接纳了民主观念对其思想的重塑，实现了从消极到积极、从固守到重构的转变，诠释了文化结构转型下主体建构的可能路径。他不再盲目地美化过去，而是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自身经历和旧有文化结构。这种重新审视使得小说中的“怀旧”不再是对过去的简单复刻，而成为对过去的批判和超越。从作者意图来看，这一转变亦反映出作家自身主体建构的深层诉求，需要深入到作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理解其生成逻辑与现实关联。

三、文化结构的批判性超越：作家主体的反思与建构

在文化唯物主义视域下，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人们的意图实践必然要从属各种现实关系，但社会现实又会对这种实践作出改变。作家既不应坐待变化，也不应屈从环境，而是要把自己的写作实践变成真正能动的社会实践”（雷蒙·威廉斯，2008，p.22）。在文学生产过程中，作家所处的文化结构对其创作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制约作用，作家也通过创作参与社会文化实践，进而对文化结构进行批判和超越。对石黑一雄而言，“怀旧”是其创作中一贯采用的叙事策略，在《长日留痕》中，这一怀旧模式更是被贯彻到了极致。小说对帝国风景的细腻描绘，与小说创作时英国社会兴起的怀旧风潮不无关系，或者说正是当时保守文化结构影响下的产物，流露出为帝国没落而惋惜的怀旧之感。详尽的风景描绘似乎透露出作家试图重构过往帝国精神的意图，但这是否意味着，作家有意在写作中为统治阶级代言呢？文化唯物主义主张将作品置于相关的历史坐标中进行考察，以重构作家的文学实践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结合《长日留痕》的创作背景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上述关于作家政治立场的解读并不成立。

《长日留痕》创作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彼时正值撒切尔夫人执政，保守党在政治文化领域占据

绝对主导地位。在全球殖民体系瓦解的大背景下，英国于 1982 年从阿根廷手中夺回马尔维纳斯群岛（英称福克兰群岛），似乎又让整个国家重温了一次“帝国梦”^②。为获取民众支持以推进新一轮扩张，保守党试图让国家重塑昔日世界霸主形象，借助社会对大英帝国的怀念，营造出帝国犹存的幻象。然而，这种怀旧情绪实则沦为统治阶层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为新一轮帝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创造了条件。石黑一雄本人曾表示：“这种英格兰神话般的风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一个不存在的时代无害的怀旧。然而，另一方面，它被用作一种政治工具——就像美国西部神话一样”（Vorda & Herzinger, 1991, p.139）。在这种文化结构影响下，英格兰独特的风景文化成为游说民众的意识载体，使民众认为“英格兰的风景在全世界都是最让人满意的，而且这种特征只有用‘伟大绝伦’一词才可能概括”（23）。然而，细读文本不难发现，石黑一雄在描写中反复强调英格兰风景之“宏大”，而这种“宏大”却建立在“缺乏”之上：“正是因为缺乏一目了然的刺激，或者奇观，才使我们国土美丽得超凡脱俗”（24）。这种刻意的强调和矛盾修辞的运用更贴近于反讽效果，在史蒂文斯略带夸张的自我陶醉中，伟大绝伦的英格兰风景被塑造为一个虚幻的帝国神话，仅存在于保守的帝国遗民不切实际的想象之中。

实际上，作家并未同小说主人公一样沉湎于已逝的帝国荣光，而是对陷于过去、企图恢复旧帝国秩序的行为提出了委婉的批判。人在本性上是政治动物，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其实践背后往往潜藏着特定的政治冲动（亚里士多德, 1965, p.7）。石黑一雄在一次访谈中，亦表露了他对怀旧的政治性见解：“念旧实际上使人们沉湎于一种更舒适，更令人愉快的生活，而那种生活却是建立在许多其他人的痛苦之上的。如今，不管你谈论的是帝国的过去还是等级制度带来的各种福份，本质上是建立在使多数英国人沦为奴仆或工人的基础上的”（李春, 2005, pp.135-136）。由此可见，石黑一雄对帝国主义持有批判态度，其寓于文本之中的主体意识也并非触不可及，正如《长日留痕》中对帝国风景的呈现，其目的反而是为了反对以盲目的怀旧情绪重建那个失落的“理想国”。

在文化唯物主义者看来，作家的主体性常常会介入到文化结构对创作的束缚之中，“以各种方式隐含着或明示着某种出自特定观点、经过专门选择的经验”（雷蒙·威廉斯, 2008, p.209）。在这一点上，石黑一雄选择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借史蒂文斯这一角色之眼反观社会，在不为自身招致争议的同时将笔触延伸到当时的政治文化领域。小说结尾处，作家也借一位前管家之口表达了对社会保守之风的批评：“别总是没完没了地回顾过去，否则你注定要意志消沉的……说实话，我俩现在都完全不再处于精力旺盛的青年时期，可你必须持续朝前看”（199）。马克思（2000, p.84）指出，“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具有主体性的作家并非单纯地受制于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而进行文本创作，作为社会文化的实践者，他也“同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处于双向建构关系中”（胡庆龄, 王丽, 2009, p.23）。与前两部以日本为背景的小说不同，《长日留痕》将故事的发展融入从鼎盛走向衰落的英国社会中，体现的正是作家对于当时英国文化结构的批判与反思，以及作为能动的主体实现“自我编纂”和“社会编纂”的写作追求（雷蒙·威廉斯, 2008, p.224）。

^② 马尔维纳斯群岛于 1883 年被英国占领，岛上多为英裔移民，经济和战略价值有限。阿根廷进占马岛，是认为衰落的英国已无力顾及这群远洋孤岛；而英国选择反击，更多是出于撒切尔夫人“不愿让英国的国威在她手上受辱”的考量。这场胜利实际意义有限，主要是在心理层面安抚了英国民众，使他们回想起大英帝国曾经的辉煌荣耀。详见：钱乘旦，许洁明（2002）：《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四、结语

在《长日留痕》中，石黑一雄将小说人物置于持续变化的文化结构场域，他们在受到文化结构制约的同时，也以各自的方式回应并参与文化结构的建构，展现出主体与文化结构之间双向影响的动态过程。在文化唯物主义看来，文化结构内化于公民的社会实践中，在帝国文化结构的限制下，忠诚于旧有体制的管家阶层逐步丧失其主体性，积极斗争的肯顿小姐也无法摆脱自主意识被消解的命运，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然而，个体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这种制约，而是同时回应着社会整体意识形态的变化。达林顿勋爵积极投身历史，但其努力却未能有效构建主体；相比之下，史蒂文斯在旅程中逐渐觉醒并反思过去的错误，求得了一条重建主体性的途径。这一转变不仅是史蒂文斯对个人命运的救赎，更是这一人物与作家自身所代表的主体对文化结构的挑战和反思。石黑一雄并非在为帝国主义谱就一曲“怀旧”挽歌，而是借助对历史的回望，表明其批判帝国主义的态度，体现了作家主动介入文本创作的主体性。直面过去不仅是为了认识历史的本质和真相，更是要通过剖析历史背后的政治文化和思想观念，借助主体的力量对历史遗产进行积极的改造和重构。石黑一雄选择在“怀旧”表象下，探究个体与不同时期文化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目的也是为了启发当下，探讨历史变动中主体建构的问题，这也是作家主体为构建更为合理的文化结构所做出的努力。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地理老年学视域下当代英国小说研究”（项目编号：23YJA752011）及 2023 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物叙事视域下 J. G. 巴拉德城市小说研究”（项目编号：GD23CWW02）的阶段性成果。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eng Danto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3-4951-8943>

Wang Taohua ^{ID} <https://orcid.org/0000-0001-7906-3140>

References

- 亚里士多德（1965）：《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Aristotle (1965). *Politics*. trans. Wu Shoupe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Beedham, Matthew (2010). *The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 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 Palgrave Macmillan.
- Colombino, Laura (2024). *Kazuo Ishiguro and Ethics*. Routledge, Chapman & Hall, Incorporated.
- 邓颖玲（2016）：“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的回忆叙述策略”，《外国文学研究》（04）：67-72。
[Deng Yingling (2016). “On the Remembering Narration Strategy in Kazu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04): 67-72. DOI: <https://doi.org/10.19915/j.cnki.fl.2016.04.009>]
- Dollimore, Jonathan (2010). *Radical Tragedy: Religion, 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 Macmillan Education UK.
- Dollimore, Jonathan, & Sinfield Alan (1994). *Political Shakespeare: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Durham, Meenakshi, & Douglas Kellner (Eds.) (2006).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ks*. Braille Jymico Inc.
- Gehlawat, Monika (2013). “Myth and Mimetic Failure in *The Remains of the Day*.”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03), 491–519. DOI: <https://doi.org/10.1353/cli.2013.0027>

- 胡庆龄、王丽（2009）：“论多利莫尔政治文化视野下的主体建构理论”，《文艺评论》（04）：21-25。
[Hu Qingling, & Wang Li (2009). “On the Theory of Subject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llimore’s Political Culture.”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04): 21-25. DOI: <https://doi.org/10.16566/j.cnki.1003-5672.2009.04.005>]
- 蒋怡（2013）：“风景与帝国的记忆——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中的视觉政治”，《外国语言文学》（02）：124-131。
[Jiang Yi (2013). “Landscape and Imperial Memory: On the visual Politics in Kazu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02): 124-131. DOI: <https://doi.org/10.19716/j.1672-4720.2013.02.009>]
- 金万锋（2011）：“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的时代互文性”，《日本研究》（02）：94-98。
[Jin Wanfeng (2011). “On the intertextuality of Time in Kazu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Japanese Studies* (02): 94-98. DOI: <https://doi.org/10.16496/j.cnki.rbyj.2011.02.002>]
- 李春（2005）：“石黑一雄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04）：134-138。
[Li Chun (2005).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04): 134-138.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1-1757.2005.04.020>]
- 林萍（2018）：“‘英国性’的拷问：后殖民视域下的《长日留痕》”，《当代外国文学》（01）：126-132。
[Lin Ping (2018). “Interrogating ‘Britishness’: A Postcolonial Reading of *The Remains of the Day*.”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01), 126–132. DOI: <https://doi.org/10.16077/j.cnki.issn1001-1757.2018.01.019>]
- 卡尔·马克思（2000）：《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Marx, Karl (2000).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84*. trans.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for the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Terestchenko, Michel (2007). “Servility and Destructiveness in Kazuo Ishiguro’s the Remains of the Day.” *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01), 77–89. DOI: <https://doi.org/10.1353/pan.0.0007>
- Vorda, Allan, & Kim Herzinger (1991). “An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 *Mississippi Review* (1/2): 131–154. DOI: <https://doi.org/10.2307/20134516>
- Williams, Raymond (1959). *Culture and Socie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aymond (1980).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Verso.
- Williams, Raymond (1985).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Raymond (199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雷蒙·威廉斯（2008）：《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Williams, Raymond (2008). *Marxism and Literature*. trans. Wang Erbo, Zhou Li. Henan University Press.]
- 向荣（2001）：“16、17世纪英国政治文化中的父权主义”，《史学月刊》（01）：93-99。
[Xiang Rong (2001). “The Patriarchalism in English Political Culture during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01): 93-99.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0583-0214.2001.01.017>]
- 周兴杰（2006）：“文化霸权”。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540-549。
[Zhou Xingjie (2006). “Cultural Hegemony.” In Zhao Yifan, Zhang Zhongzai, & Li De’en (Eds.), *Keywords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540-549.]